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

中国减贫为全球南方提供有益借鉴

哈桑·拉杰卜

消除贫困是全球性难题，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国际减贫交流合作。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指出："中方愿同非方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减贫、就业等领域合作，提升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同推动现代化惠及全体人民。"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为促进全球减贫合作走深走实，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平台。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各方凝聚共识，加快全球减贫进程。中国在2021年宣告消除千年绝对贫困，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全球南方国家减贫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全球南方国家唯有系统研究中国减贫实践和发展经验，才能更好将其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进而助力各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中国脱贫攻坚经验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经过艰苦努力，如期实现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中国减贫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将改革与经济增长、农村发展与工业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资本投资、完善公共政策体系与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结合起来，并且在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并没有将完成这一任务视为终点，而是转向防止返贫致贫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可以说，中国的减贫经验涵盖多个方面，具有广泛参考价值。

第一，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的必要条件。中国减贫经验值得研究之处，在于减贫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减贫问题说到底是发展问题。在国家发展中，一种常见倾向是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割裂开来，仿佛选择其中之一就必然要牺牲另一个。然而在中国，消除贫困始终与发展农业、工业、贸易以及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相互联系。中国经验表明，减贫本身蕴含在发展过程中，不能脱离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能为就业创造、收入提高和公共服务投入提供支撑，当经济增长建立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机会扩大的基础之上，并将增长成果引导至相对落后的地区和群体时，经济增长本身就可以成为有力的减贫"工具"。

由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2022年共同发布的《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报告指出，中国取得的减贫成就与自身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密切相关。而这一增长又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机制作用的扩大以及政府持续对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等领域进行的公共投资。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农业吸纳了庞大的人口，而经济则面临生产率低下和激励不足等问题。彼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非从大城市和现代化工厂展开，而是从农村起步。通过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明显加快，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随之增加，收入增加后，新的需求便产生了，需求扩大后，农业之外就出现了新的经济机会。正是在这一循环中，农村乃至全社会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来看，对于那些至今仍有很大比例人口从事农业的国家而言，这一经验尤其具有启示意义：一些国家发展落后并不在于有大量人口从事农业，而在于其农业长期处于低生产率状态，并与工业、服务业以及市场相割裂。

第二，统筹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中国减贫实践中，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是对"物"的单纯支出，而可以理解为是对减贫的投资，在整体上有力降低了人们获得发展机会的成本。人们很容易将发展想象成建设一座工厂或一所大学，但对于一个相对偏远的村庄而言，道路、电力、供水网络和通信设施等可能才是刚需。道路条件恶劣，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成本就会更高；互联网缺失，村庄就会被排除在数字经济之外；学校距离遥远，获取人力资本的成本就会上升……而这恰恰是许多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许多国家拥有一些成功的单体项目，却没有很好地将这些项目融入经济体系。没有道路的工厂、缺乏冷链体系的农场、没有综合交通网络支撑的港口以及与市场缺乏联系的大学，虽然这些基础设施在物理上已经存在，但都无法充分释放其经济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的过程，还伴随着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要认识到，一个国家不可能仅仅依靠向扶贫项目投入资金来增加援助规模就能使近亿人口真正摆脱贫困。减贫进程与医疗、教育、预期寿命以及其他民生福祉相关指标的改善密切联系。中国不仅试图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更试图让贫困人口具备依靠自身提高收入的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仅以收入衡量的贫困或许已经消除，但"机会贫困"仍可能存在，即有劳动能力、有改变意愿，但缺少就业岗位、信息渠道或上升路径。因此，一个希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国家，就必须提升人的自身能力，包括知识、健康、技能以及获取信息等能力，也就是投资于人要实现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性投入。通过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切实提升贫困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制度建设和强大的治理能力同样重要。深刻的转型不可能仅靠一项政策举措就得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便不断积累和完善各种减贫工具，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转向大规模专项扶贫开发计划，到开发式扶贫与保障性扶贫相结合，再到广为人知的精准扶贫方略。这一渐进过程揭示出一条经验：一个公共政策要想取得成功，并不取决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伟大的构想，而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备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调整政策的制度创新能力。比如，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农村取得成效的政策，在2000年未必仍然足够有效；在工业较为发达地区行之有效的做法，也未必适用于山区和偏远地区。因此，随着贫困形态不断变化，政策工具也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

中国减贫的成功还得益于政府的有效治理。中国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通过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机制，搭建起了统一协调、层层贯通、上下联动的责任体系，着力提升扶贫整体效能。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中国将大量资源和工作人员下沉到乡村一线，派驻工作人员扎根村里，直接了解贫困家庭的实际困难，确保政策能够精准落到实处。与此同时，还建立起监督、评估和修正机制，持续跟踪项目进展、检查资金使用情况，便于及时发现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并加以调整。这些有效的治理措施，是中国减贫事业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第四，精准有效的政策比平均分配资源更具效率。家庭致贫原因各不相同，贫困地区的发展条件也不尽相同。一个贫困家庭可能因为疾病、距离市场过远、教育水平低下、缺乏适宜耕种的土地、就业机会不足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导致收入不足。如果向所有贫困户提供完全相同的援助，就等于假定所有贫困现象都具有相同的成因和性质。然而，贫困不是只有一个诱因，致贫原因多元化、差异化普遍存在，单一政策不可能解决所有贫困问题。一个无法衡量结果、识别受益者、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政策的项目，即便拥有庞大的预算，也可能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因此，仅仅知道贫困在哪里还不够，还必须知道贫困为什么存在。这样才能实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保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中国采取了精准扶贫，做到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实现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精准扶贫以"六个精准"为基本要求，强调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并通过综合运用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就业扶贫、危房改造、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启示，在许多国家，扶贫项目之所以失败，往往是因为这些国家将全国层面的贫困现象视为同一化的社会状态。

第五，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消除绝对贫困，并不等于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它所意味的，是从应对"绝对贫困"转向应对"相对贫困"，从单纯提高收入转向提高生产能力，从关注生存转向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中国设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对脱贫地区、脱贫人口实施跟踪监测，确保支持政策不断档。同时将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医疗条件改善与乡村全面振兴相结合，政策目标逐渐从消除贫困转向防止返贫致贫和乡村全面振兴。过渡期内，中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脱贫地区自主发展能力持续增强。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推动帮扶政策向常态化转型，确保帮扶政策始终保持总体稳定。2025年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着眼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从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若干领域提出了主要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农民生活更加美好、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基本建立"。由此，一个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启示愈加清晰：真正的减贫成功并不止于走出贫困，而是在走出贫困之后，让再次陷入贫困变得不那么容易。

为世界减贫提供中国方法

如果将视线从中国国内转向国际，就会发现，中国的减贫经验具有世界意义。减贫已经成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尤其体现在农业、粮食安全、技能培训、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验交流等方面。

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在解读中国经验时，需要警惕一个最为常见的误区，就是认为中国提供了一套可以直接复制的"模板"，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未必具备的独特条件：庞大的国内市场、长期积累形成的教育基础、较高的储蓄率、具有较强资源动员能力的国家治理体系、工业基础以及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具备的条件，包括教育、医疗、储蓄和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基础，也为其加快追赶发展进程提供了有利条件。

实践表明，中国最值得全球南方国家借鉴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获得财政援助的国家，也许能够建造一所学校，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建立教师培养体系，并将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连接起来，那么其建立的便是一种发展能力；一个获得农业机械设备的国家，也许能够在一个生产季提高产量，但如果其同时拥有研发中心、灌溉体系、融资机制和营销体系，那么构建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发展中国家今天面对的不再只是单纯的资源不足问题，还面临着如何将技术、贸易、能源、数据和基础设施转化为惠及广大民众的发展机会。中国经验的价值并不在于让全球南方国家机械地照搬，而在于帮助这些国家寻找适合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案并切实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多地将培训、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与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结合起来。例如，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日益重视职业培训以及农业、医疗和数字领域的能力建设，同时积极推进交通、能源和通信等领域的项目落实。伴随着知识、技能和技术成为项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项目的目标也就从单纯完成项目建设，转向构建一种能够在项目结束后继续发挥作用的能力。

由此，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未来的发展并不是简单从这样一个问题出发：有多少钱可以用来扶贫？而应从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开始思考：如何建设一种经济体系，使贫困人口能够获得稳定的工作、优质的教育、基本而有保障的医疗、通往市场的道路以及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

贫困并非某种地理宿命，但它也不是靠口号或短期援助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贫困不只是个人能力或努力的问题，而是由经济、社会和制度结构共同造成的。只要一个国家拥有长期发展愿景，具备有效执行能力的制度，愿意不断试验和纠偏，并真正相信贫困人口不仅仅是发展的受益者，也应当成为发展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贫困局面就是可以改变的。

中国减贫不只是一则写在著作中的国家成功故事，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项揭示一个国家如何引导社会从"生存"问题走向"发展"问题的实践，也是一项展示如何将摆脱贫困从解决收入不足的问题，转变为破解生产、机会、基础设施以及进入市场能力等方面失衡问题的实践。正因如此，中国减贫经验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不是因为其提供了一套可以照搬的现成方案，而是提供了一种可以适应各国国情的发展逻辑。只有当减贫从单纯弥补贫困者的不足转变为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时，贫困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而持久的消除。

（作者系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

要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中方愿同非方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减贫、就业等领域合作，提升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同推动现代化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主席2024年9月5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各国政党努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中国共产党愿为人类减贫进程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习近平主席2021年7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中国将继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你输我赢、赢者通吃不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坚定一员，中国将不断深化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缓解债务压力、实现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习近平主席2021年1月25日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蕴含深远意义

祁苑玲

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前行道路上，有顺境也会有逆流。我们要坚持目标导向、行动导向，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作出不懈努力。

——习近平主席2023年10月18日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即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经过多年实践，共建"一带一路"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向精耕细作的"工笔画"，成效斐然。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些年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各方共识，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理念化为行动，从愿景变为现实，给相关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当前，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沉渣泛起，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探索和实际成效，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有益经验，应把握蕴含其中的深远意义。

其一，回应人类共同关切，夯实全球治理的现实基础。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目前，全球南北发展差距依然明显，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中高端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迫切需要获得更多机会和条件。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切实推动"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助力共建国家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民生福祉，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这些年来，陆续建成铁路、港口，不断推进海关互认、技术标准对接，深化投资、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人文交流、文化交融，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信任。同时，依托现有世界秩序，通过探索、协商、合作、改进和补充，将世界紧密连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实现共赢。尤其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得到资金、技术支持，实现快速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夯实了全球治理的现实基础，有力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

其二，树立正确义利观，增进全球治理的理念共识。

重视道义与责任，是新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在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我国始终践行正确义利观，贯彻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方针，将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相结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持续的行动中，中国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合作框架，引导合作各方追求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例如，非洲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伙伴。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人力资源、清洁能源等领域开展了广泛且深入的合作，助推非洲地区的发展效能持续提升。

随着世界各国利益交织愈来愈密切，人类需要共同面对气候变化异常、地缘冲突加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人口老龄化、粮食安全和网络安全等问题，应秉持正确义利观，坚持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倡导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探索完善全球治理，引领国际社会走出时代困境、实现共同繁荣。

其三，抓好项目落实，提高全球治理的整体效能。

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务实合作的重要载体。交通和能源项目改善发展条件，产业投资项目形成新发展动能，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助力减贫，职业教育和人才培养项目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人文交流项目推进文明互鉴……通过"硬基建+软民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合作领域与范围从基础设施建设向产业合作、民生改善和能力建设不断拓展。近年来，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加速完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架构基本形成，为促进经贸和产能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实中，各国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问题也各有侧重，全球治理可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推动国际合作各方寻找合适的结合点，实现有针对性的协商、具体化的建设，便于成效评估。特别应注意的是，从形成共识到行动安排直至解决实际问题、收获成效，需要统筹好政策协调、资源投入、具体操作乃至后期运营，以提高全球治理的整体效能。

其四，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扩大全球治理的参与空间。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此框架下，各国通过对话协商表达各自意愿，确定形成发展战略和合作规划，共同出资建设，共同享受成果，充分调动了共建国家的参与积极性，扩大了其话语权、提高了其国际地位。10多年来，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扩大共同利益。

如今，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是当前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特征，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不断上升，已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尚需扩大。对此，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其五，加强机制衔接，汇聚全球治理的强大合力。

机制建设对于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重加强对接共建国家发展战略，已在经贸、能源、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建立30多个专项合作机制。更重要的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现有国际发展框架在理念、目标和举措等方面高度契合，旨在强调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加强衔接、形成合力，凝聚全球治理共识，为落实2030年议程、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正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方向前进，持续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与正能量。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剧，愈加需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这就需要各国在维护自身合理利益的同时，自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关系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以制度层面的确定性对冲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

【作者系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副校（院）长】

本版编辑 段云鹏 美 编 夏 祎